

文艺学 方法论 讲演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编



文 艺 学

方 法 论

讲 演 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10.75 插页2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3,000 册数: 1—5000

•

SIBN 7-300-00012-6/I·3
书号: 10011·57 定价: 2.65元

编辑说明

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文艺理论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为了适应高校文艺理论教学和科研更新的需要，促进全国文艺学方法讨论的深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于1985年9月在北戴河举办了文艺学方法论研讨班。全国高校文艺理论教师、文艺报刊编辑共八十余人到班学习。研讨班除本校教师承担部分讲题外，主要邀请了全国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陈涌、陆梅林、程代熙、钱中文、吴元迈、胡经之、章国锋、王向峰、林兴宅、鲁枢元来班讲学。他们的演讲内容丰富，从文艺学方法论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深受学员们的的好评。现将他们的讲稿汇编成书，取名《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公开出版发行，以资参考。

本书全部讲稿均为作者本人定稿，讲题的目录按照内容的逻辑规律予以编排。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一九八六年元月

目 录

关于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陈 涌 (1)
文艺学方法的多样和统一·····	胡经之 (21)
论文艺学方法论的层次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陆贵山 (42)
从思维方式角度看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 批评中的运用·····	林兴宅 (64)
文学心理观·····	鲁枢元 (84)
现代心理学与文艺研究·····	周文柏 (117)
接受美学的理论与实践·····	章国锋 (141)
结构主义漫评 ——读书札记·····	程代熙 (165)
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倾向·····	张秉真 (200)
苏联文艺学的历史功能研究和结构符号探讨·····	吴元迈 (220)
文艺研究方法的审美功能·····	王向峰 (253)
文学规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兼谈文学理论的体系·····	郑国铨 (277)
文学的反思与观念的更新·····	陈传才 (300)
开创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的新局面·····	蒋培坤 (316)

关于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陈 涌

人类认识的方法是人制定的认识工具，但科学的方法并不是主观任意的，它必须和研究对象的本质一致，和研究对象本身的规律性一致。科学的方法是对象本质和规律性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认识论是一致的。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文艺同时具备着它的普遍本质和特殊本质，普遍本质和特殊本质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我们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整个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各个部门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文艺也没有例外。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它独自的特殊的本质。为了认识每一具体部门意识形态，需要把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和这具体部门的特殊本质结合起来，这对文艺也没有例外。

文艺学方法论的问题，主要就要正确地解决文艺的普遍的本质和文艺的特殊本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方法论，只能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全部意识形态的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全部意识形态的方法论的基础，因为在我们看来，理论和方法是一致的，研究理论，转过来便变成方法。

但文艺学的方法论，还需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文艺的特殊本质结合起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文艺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理论和方法。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我们研究文艺问题，往往主要注意到文艺和其他意识形态共同的方面，而很少注意它和其他意识形态不同的方面，也就是说，往往主要注意到文艺和其他意识形态部门的共同的本质，而很少注意到文艺的特殊的本质。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方法，使我们忽视艺术规律的研究，使我们不能正确地估计艺术规律的重要性。影响所及，在创作实践上因而也不能真正发挥艺术所独有的，为其他意识部门不能代替的特殊功能。公式主义的创作不少时候大量出现，文艺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都受到很大的束缚。

几年来，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人所共见的；文艺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活跃的繁荣的局面。这和教条主义的克服，在认识和实践上开始比较合理地处理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普遍本质普遍规律和文艺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的关系，艺术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但和过去的情况相反，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用文艺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来排斥文艺的普遍本质、普遍的规律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被认为是过时的“传统观念”、“传统方法”，应该用“新观念”、“新方法”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至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传统观念”、“传统方法”。马克思主义被作出种种并不符合它的原貌的解释，实际上它是被歪曲，被漫画化了。也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只能解决文艺的“外部规律”问题，文学研究应该回到“内

部规律”，应该“回复到自身”。

这些问题是引人注目，应该受到关切，也是值得研究的。这不是枝节问题，也不只是个别理论问题，而是直接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命运。

—

近几年来，刘再复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论文。他发表得较早的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的论文在文艺界发生强烈的反应，这里所说的强烈的反应，包括赞赏的也包括持批评态度的，但如果说，刘再复同志关于性格二重组合的论文，主要还是着眼于文学典型的理论问题，那么，以后他发表的许多论文，便包含更加广泛的系统的性质，它牵涉到一系列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我这里不可能也不打算全面地评论刘再复同志的理论工作，只打算就有关方法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正因为方法论的问题是不可能和理论观点的问题完全分开的，因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也没有可能避免牵涉到理论观点。

刘再复同志在一篇叫作《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的论文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研究的革新的看法，刘再复同志引进了国外文学研究的一些新方法，也颇为详细地介绍了近年国内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的尝试和探索，这首先对开拓我们的眼界是大有裨益的。这里的许多具体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当然需要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作出判断，但刘再复同志在论述到近年文学研究的趋向时，却这样介绍他认为是“引人注目”的“由外到内”的趋向：

“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互相联系，文学各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

被刘再复同志认为是属于“外部规律”的，既有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规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也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阐明的规律（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因此，人们就有理由说，刘再复同志已经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学问题的基本原理，都纳入他所说的“外部规律”的范围内。而过去只“着重”研究这些“外部规律”，这种情况在刘再复同志看来是应该根本改变的。近几年，文学研究的生机的表现之一，正在于开始有了这种根本改变，正在于“由外而内”，由研究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等转而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等等，也就是说，“回复到自身”。

但正是这种“由外而内”，文学“回复到自身”，使我们不能不说刘再复同志在文学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理论，个别结论，而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基础。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都有它的经济的基础，或者说经济的前提。问题不只是人们从事文学艺术创造之前首先要生活，要穿衣、吃饭，问题还在于每一个时代的经济性质归根到底决定文学艺术的性质。每个时代每个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可以发现它的经济根源，或者说经济内容。政治是集中地反映经济的需要的，因此，每个时代，每个阶级的文艺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政治内容。这是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除了自然科学以外，全部有关社会生活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出现了一次真正的革命。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其他别的理论，第一次使我们对文学艺术根本规律，有可能达到真正客观的完整深刻的科学认识。

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是一种假设，它本身就从整个人类的历史，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整个人类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提炼出来的。如果说，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人们对阶级出现以前的原始社会还知之甚少，那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出版，便进一步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全部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普遍真理。恩格斯说：“摩尔根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不但高度地称赞了美国人摩尔根，而且也进一步确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的科学意义。

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究过古代希腊、文艺复兴以及十八、十九世纪这几个欧洲文学史和艺术史的最重要的时代，他们对这几个时代的艺术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和政治经济的联系所作的论述，无疑是他们的观点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实际应用。

希腊艺术的繁荣是在希腊经济的相对的繁荣，是在希腊所特有的城邦奴隶制的民主制的基础上出现的。古代希腊的经济、政治的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希腊艺术的特点。恩格斯所盛赞的希腊哲学的活泼自由的特点，在整个希腊艺术上也是得到同样体现。只要稍一比较，我们便会发现，古代希腊艺术，和古代东方艺术的巨大差别。如果说，古代希腊艺术所体现的是活泼自由的思想，是相当程度的“人的解放”，那么，例如中国殷周奴隶制时代的青铜艺术，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对于人的压抑，更多的感觉是君临在我们头上的神秘的威慑的力量。尽管中国的青铜艺术体现了在

当时是极高的技术水平，但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来，中国的青铜艺术无疑反映了东方寡头专制的奴隶制的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东方的奴隶制是“众人皆是的奴隶制”。

如果说，殷周青铜艺术所特有的令人感到压抑、感到有一种在我们头上的神秘的威慑力量的特点，因而和古代希腊艺术的活泼自由的感觉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这种差别，归根到底，来源于两种奴隶制的经济和政治的差别，这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从战国开始，我们看到了艺术所体现的精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那种神秘的威慑的感觉，以及过分繁缚的结构，开始转向疏朗、开阔，也就是说，开始令人感到有一种比较活泼自由的精神。简单的历史类比常常是不恰当的，但似乎恩格斯所盛赞的活泼自由的思想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才开始见其端倪。精神的变动，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动，离开这个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现象，不可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面貌是这样的，而另一个时代又是那样的？这个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后才第一次得到彻底的科学的解答的。

二

文艺没有绝对的独立性，只有相对的独立性，文艺没有绝对独立的历史，只有相对独立的历史，文艺的审美特点也不可能是绝对独立的，文艺、文艺的历史、文艺的审美特点，归根到底，只能从经济事实去求得解释，归根到底，人们的生活的求得方式怎样，人们的文艺也就怎样。那种把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看作只是“外部规律”，而要求回到文艺的“审美特点自身”，是不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而

且，也一般地离开了唯物主义的。

但历史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没有共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看作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或者说最后决定因素，恩格斯有时也说是最后动力，但不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认为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唯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经济基础对全部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时，并没有忘记过其他因素的意义。马克思在自己校订过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里，便特别加上这样一个论述，认为气候、土地肥沃的程度，对经济发展状况，以致对人的精神，人的心理素质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最全面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列宁语），它和庸俗唯物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和单向线性的因果关系的思维方法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决不能根据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又刻意加以漫画化的想当然的谈论，或者简直就是“耳食之谈”来判断马克思主义。还是那个人所熟知的教导：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教导现在也没有过时，因为现在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不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批评的批评家，而是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其实是贫乏不堪的。

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如何真正全面地历史地分析社会生活问题的，我们不妨回到他对古代希腊艺术和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在分析希腊艺术的繁荣时，并不认为它是建立在希腊经济的绝对高度的基础上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经济发展的高度不但超过了古代希腊，而且超过了过去任何时代。但和那种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可以决定一切，可以直接决定艺术发展水平的庸俗论者不同，马克思在考察艺术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时，不只是注意到生产力发展的高度，而且总是同时探究

每个时代的经济的性质和特点，看它对人的精神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那方面是有利的和那一方面是有害的，从而得出他的著名的结论：资本主义虽然开辟了人类生产发展巨大的可能性，虽然从历史的远景看，对人类的艺术发展以至精神发展是有利的，但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和资本主义的分工，却使人变成分工的奴隶，使人异化，而古代的个体经济，它无疑是狭小，有着很大的局限的，但它却又在狭小的受到局限的范围内，使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一句话，人的内在的本质力量得到自由显露。也正是因为这样，个体劳动，却仍然有着一定的诗意，能够艺术地加以再现，而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我们只能看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却看不到歌颂资本主义劳动的真正的艺术作品。

下面一段话，马克思把古代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加以比较，是无比深刻透彻的，它对于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是庸俗社会学，是单向线性因果关系的思维方法的曲解，应该是有促使他反省的作用的：

“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

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它就是鄙俗的。”^①

在现在，我们也仍然看到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可以决定一切的观点在流行，在文化领域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而在文化艺术方面也自然是高度发展的。反过来看，我们中国过去是一个小生产长期存在的国家，因此，文化上也注定是落后的。在西方国家面前自惭形秽，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可说已到了数典忘宗的地步。

如果说，对于那种把经济看作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决定因素的庸俗观点，恩格斯在他的晚年已经提出过严正的批判，认为这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那么，现在我们遇到的竟是把生产力看作是社会生活（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的唯一决定因素，显然，这种观点比恩格斯晚年所批判的观点，就更是等而下之。但是现在持有这类观点的人，往往是庸俗社会学的积极的批判者，他们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庸俗社会学混淆起来进行批判，他们也是单向线性的因果关系的思维方法的批判者，而且也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看作是单向线性的因果关系的思维方法。对于这种作法，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有自己坚定的一贯的理论原则的，它并不是什么“封闭体系”，按照列宁的确切的论述，马克思主义是过去全部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过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真正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任何宗派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对人类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

① 马克思：《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

都不但不会排斥，而且，相反地用这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来丰富自己。这是作为人类思想发展的最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失掉这种本性，马克思主义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走向衰亡。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系统论。系统思想既然是一种辩证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思想的重要成果，它和马克思并不矛盾是很自然的。但系统思想主要是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的结果，不论它多么合理，它也代替不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事实上，现在有些尝试用系统思想去分析文艺作品的论文，也不能不借助于社会的历史的分析。认为只要有了系统思想，对文艺这种社会现象的研究也就通行无阻，可以抛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是一种太过匆忙的、欠考虑的看法。

现在的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保守狭隘的思想是存在的。这种思想否认马克思主义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新的经验，新的科学思想成就加以推进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的确有人不是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打算用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代替、补充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宣传系统思想，却实际上用折衷主义来解释系统思想，他们在合理地肯定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问题时，却把处于不同层次，因而意义和作用不同的因素并列起来，例如把决定文艺的政治、经济的因素和其他因素并列起来。这种折衷主义的观点无助于理解文艺的本质，而只能模糊文艺的本质。

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文艺现象是必要的，过去的确存在着机械单一化的缺点。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肯定文艺是政治经济的反映的时候，我们往往容易忽视了决定文艺发展的其他因素，例如，作家艺术家的个人因素、民族因素、传统、乃至地理环境的因素，这一切因素都给予文学发展面貌以影响，不估计到

这些因素的作用是不全面的。但是不能不看到，上例的许多因素，它对文艺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不能等量齐观。经济是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最后决定因素，或者说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通过政治对整个思想的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

也因此，肯定了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这就是肯定了基本的事实，抓住了文艺发展变化的基本的普遍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的要点就在于首先肯定这个基本事实，这个基本的普遍的规律。

如果从认识论来看，那么，肯定文艺来源于生活，肯定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同样是重要的，同样是人类文艺历史的基本事实，基本的普遍的规律。但文学和政治，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否仅仅用“不排斥”政治，用“尊重”反映论便能说明问题？用“不排斥”政治，用“尊重”反映论来代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代替意义十分确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后退的表现。

三

看来，刘再复同志不只是一般地谈论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他主要是着眼于用他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历史。对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以来的文学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作出了自己的估价。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文学的理论和方法，就表达得更加清楚。

在他的《文学的反思和自我超越》这篇文章里，刘再复同志

说：

“近年来，文学上的反思热情显然从文学创作领域涌入了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文学研究者对文学自身的反思，即对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

刘再复同志认为中国现在正进行着一次理论上的变革，用他自己的说法，便是一次“积极的调整”或“积极的设计”，他对这种“调整”和“设计”的历史意义是这样估计的：“这是我国新文化发展进程中又一次积极的调整，甚至可说是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次积极的设计。”为什么说是“又一次”呢？因为“五四时期是我国第一次规模宏大的新文化建设。”看来，刘再复同志认为这次对于“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的重新审视”是五四以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

但我们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可能引起看法分歧的问题也在这里。

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中国革命终于在三十多年前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个事实是不能不承认的。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化艺术的革命，根本上也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部分而出现的。因此，要说中国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便必须首先而且主要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不错，我们有过种种错误，其中更多的是“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包括庸俗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等的错误。但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思想史也和政治史、政治思想史一样，并不只是错误的历史。只要我们对问题采取全面的历史的分析态度，便不能不承